

论勾云形器的艺术造型与思想内涵

——读《哈民玉器研究》

王 鹏

〔关键词〕勾云形玉器 红山文化 造型 萨满教

〔内容提要〕出土位置、摆放方式及器身上穿孔的情况,均不能说明勾云形玉器的使用方式。《哈民玉器研究》通过微痕分析并根据其他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提出,穿孔在下有可能为勾云形器使用时的正方向。以此种方式观察,勾云形玉器呈现出回首的双鸟或单鸟造型。禽鸟是萨满教中神灵陟降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中国分类号〕K87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20)03-0104-09

哈民忙哈遗址^①是继南宝力皋吐^②之后,近年来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又一项重要考古发现。由吉平、邓聪先生主编《哈民玉器研究》一书(以下简称《研究》)以哈民遗址出土玉器(包括玉器本身及其存在背景)作为研究对象,系哈民遗址最新的研究成果^③。同时,《研究》以哈民玉器为中心,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对北亚(包括东北亚)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史前玉器技术传统进行分析,以此讨论该地理范围内的玉器交流,并在原始萨满教的背景下^④,探索史前玉器的思想内涵,因此,该书又是宏观研究北亚史前玉器的著作。

《研究》共四章,各章由多位作者撰写的多篇论文组成,然篇与篇之间、章与章之间前后联系紧密、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以哈民为中心、放眼北亚的史前玉器研究专著。《研究》前三章各章均配有专门的、数量相当可观的彩版,这不仅使哈民以及哈民以外北亚地区很多著名遗址出土的玉器首次得到多角度、多细节地高清呈现,更使作者基于微痕分析所提出的论据一目了然,因此,该书又是一部质量颇高的研究性图录。

从内容上看,《研究》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哈民遗址发掘和玉器研究”,由“哈民遗址发掘概要”“哈民遗址出土玉器述略”“哈民遗址出土玉器的规律及其性质浅析”“哈民灾难社会中生死相依与玉器继承”这四篇组成。该部分主要介绍哈民遗址及玉器,总结出哈民玉器出土的规律:“玉器、人骨和碳化建筑木构件在Ⅲ区和Ⅳ区的中型房址中几乎是共存发生的”,且玉器“常见于人骨的颈部、胸前,或散落于腰腹之间”,因此,推测“哈民房址出土的玉器主要以装饰功能为主”^⑤。在此基础之上,重建房址内人骨的埋藏过程,并尝试对灾难发生后的人群的行为进行解释。值得指出的是,该章前后两部分的彩版“哈民玉器发现与整理”“哈民房址出土的玉器”公布了哈民遗址2010—2014年发掘区的平面图、航拍图,以及几乎全部的出土玉器及其所在单位的图片(包括17座房址中的12座,其余5座房址的材料除F26外均见于书中其他插图),可供不同的研究者各取所需,进行其他方面的研究。

第二部分为第二章“哈民与东北亚玉器交流”,由“贝加尔—岫岩史前玉器交流”“后套木嘎

〔作者简介〕王鹏,男,198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100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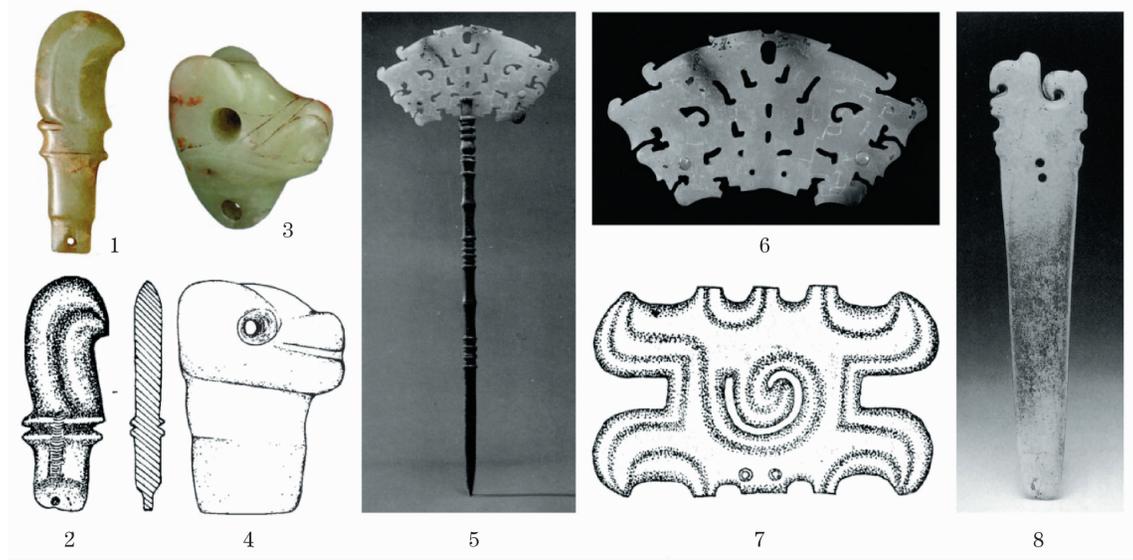
遗址出土玉器及相关问题”“内蒙古哈民玉器穿孔之南北体系”这三篇组成。该部分通过对比贝加尔、岫岩两地所产玉料及北亚史前遗址出土玉器的色调、透明度等表面特征，并结合对地理空间、器形和制作技术等方面的考虑，复原出欧亚大陆北部人类历史上以玉器为代表的文化交流的历史：旧石器时代晚期贝加尔湖沿岸的马尔他—布列奇文化开始利用当地所产的软玉制作饰物，之后真玉文化逐渐向东渗透，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到青铜时代，产自贝加尔湖沿岸的玉料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我国的东北地区，哈民玉器的“哈民式穿孔技术”有可能即在此过程中自吉林、黑龙江和贝加尔地区传入；距今5000年前后，以“中孔轴心旋截技术”为代表的格拉兹科沃白玉传统在贝加尔地区形成，此后，一方面格拉兹科沃玉器（或技术）向西传播至西西伯利亚乃至东欧平原；另一方面，格拉兹科沃技术（或玉器）向东传播至俄罗斯远东以及我国的东北、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由于该结论是建立在实地调研以及微痕研究的基础上，因此，具有非常大的可信度，并且对今后的研究具有宏观的指导作用。

第三部分为第三章“哈民与红山玉器源流考”、第四章“旧、新石器时代萨满道具演化”，由“从哈民到红山玉器的互动”“双勾云形器的技术构造”“哈民双勾云形器及源流考”“哈民式简化勾云形器辨识及源流考”“哈民勾云形器上条状螺旋槽痕迹解读”（第三章），以及“西伯利亚萨满倒挂信仰起源”“勾云形器三种摆置方式探索”“东北亚史前萨满教的发展”（第四章）八篇组成。该部分主要研究双勾云形器：通过分析哈民遗址出土的2件双勾云形器以及3件简化双勾云形器的外观及制作技术，认为其属于红山系统，甚至是直接来自于红山文化；通过分析双勾云形器的使用方式，探讨其艺术造型和思想内涵。以下主要评论第三部分的内容。

在红山文化玉器当中，以抽象造型的箍形器和勾云形器最为重要和神秘。目前，2007年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出土的玉龟、签^⑥，已经使红山文化箍形玉器的性质、功能等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决^⑦，但学术界对勾云形玉器的认识，仍是众说纷纭，存在较大争议。讨论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的思想内涵，首先要明确其艺术造型，而艺术造型的确认需要考虑其使用方式。作者正确地指出，勾云形玉器“在出土位置及摆放方式方面，提供了对象征意义理解的重要基础”^⑧，同时其上的穿孔“与该器物形象解释有着重大的关系”^⑨。

关于出土位置及摆放方式，作者认为，“牛河梁五处墓葬中勾云形器摆置方式，都是竖置，背面朝上”^⑩，这与勾云形玉器竖置、装柄使用的假说相符，但勾云形玉器上未有承接装柄的设计构造和装柄痕迹，且“这样出土竖置状况勾云形玉器，究竟和红山人对勾云形玉器形象视觉设计的关系如何”^⑪，并不能确定。实际上，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勾云形器，除了竖置（N2Z1M14:1、N2Z1M22:2、N2Z1M27:2、N5Z1M1:4、N16M15:3）以外，还有斜置（N2Z1M19:2、N2Z1M21:3、N1679M2:1）和横置（N2Z1M24:3）的情况，且勾云形器出土时穿孔的位置并不固定（或在上、在下，或在左、在右）^⑫，这或者说明葬仪主持者摆放勾云形玉器的随机性，或者说明勾云形玉器具有多种使用方式，因此，并不能根据勾云形玉器的出土位置和摆放方式明确其使用方式。

关于勾云形玉器上的穿孔，作者认为，用于“以绳索系挂，是没有问题的”^⑬，这得到了微痕方面证据的支持。比如，哈民F46:7方形璧在一端并置的一对小孔，与勾云形玉器上所常见者相同，明显存在绳索悬挂的磨损痕迹^⑭，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可能并非所有勾云形器上的穿孔均用于绳索悬挂，比如，作者所举辽宁省文物总店藏^⑮及那斯台采集^⑯的简化勾云形器，穿孔位于一端的凸隼之上，便很有可能是用于穿插销钉固定（图一，1、2）。这种固定方式还见于辽宁省文物总店藏的“玉雕龙首”^⑰，以及半拉山遗址出土的“兽首形柄端饰”^⑱（图一，3、4）。另外，那斯台采集的单勾云形玉器^⑲，双孔位于明显的平隼之上（图一，7），与西朱封M202玉冠饰相似^⑳（图一，5、6），可能亦是用于穿插销钉固定。若是如此，这些勾云形玉器在使用时无疑是穿孔在下的，如同养德堂收藏的鸟形“玉权杖”^㉑（图一，8）。除此之外，作者还分析了贝加尔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马尔他遗址出土的人像和鸟雕像。马尔他遗址出土的30余件人像，近1/3在下肢底部有穿孔，各式鸟雕像在足部及尾部也常见穿孔的现象，作者推测这些穿孔用于悬挂，此时穿孔在上，人与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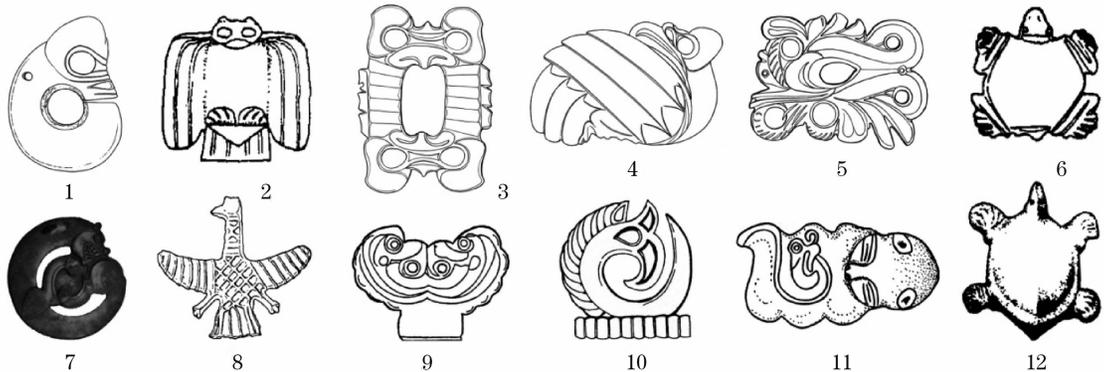
图一 玉器的穿孔及使用方式

1、3. 辽宁省文物总店藏 2、7. 那斯台采集 4. 半拉山遗址出土 5、6. 西朱封 M202 出土 8. 养德堂藏

的头部向下倒挂。但出土状况显示，部分人像是足部向下竖插在地面或驯鹿脊椎骨中的，所以，不能排除部分人像头上足下“竖立于地上，更或绑缚竖立”的可能性^②。因此，亦不能根据勾云形玉器上的穿孔明确其使用方式。

总而言之，出土位置、摆放方式以及穿孔均不能明确指向勾云形玉器具有单一的使用方式。很有可能，勾云形玉器的使用是多种方式并存，正如民族学材料所显示，近代西伯利亚萨满教中的鸟类雕像，既可正立又可倒挂^③。因此，哈民 F46: 11、F47: 9、F57: 2-21 简化勾云形玉器长边上的穿孔与短边上的穿孔并存，并且后两者长边上的穿孔有破损，这所显示出的“由横向改为纵向系挂的变化”^④，与其说是“表现出在红山文化末期，就出现了简化勾云形玉器在使用系挂方式方面的重大变化”^⑤，不如说是表现出勾云形玉器存在多种系挂方式，或者说是以横向悬挂相对优先。

既然如此，便不能囿于穿孔的相对方位来考虑勾云形玉器的造型。根据考古学和民族学上普遍存在的器物倒挂的现象，作者大胆地假设穿孔在下时双勾云形器为正方向，这使问题变得豁然开朗。作者倾向于认为双勾云形玉器是一正视的“亦人亦兽变体，也可能是龙头，头上满载太阳的放射性光芒”，将其与龙山及夏商周时期的兽面或人面形象相比较，并举三星堆二号坑的青铜兽面为证^⑥，颇具说服力。但是我们认为，将勾云形玉器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北方系青铜器及斯基泰—西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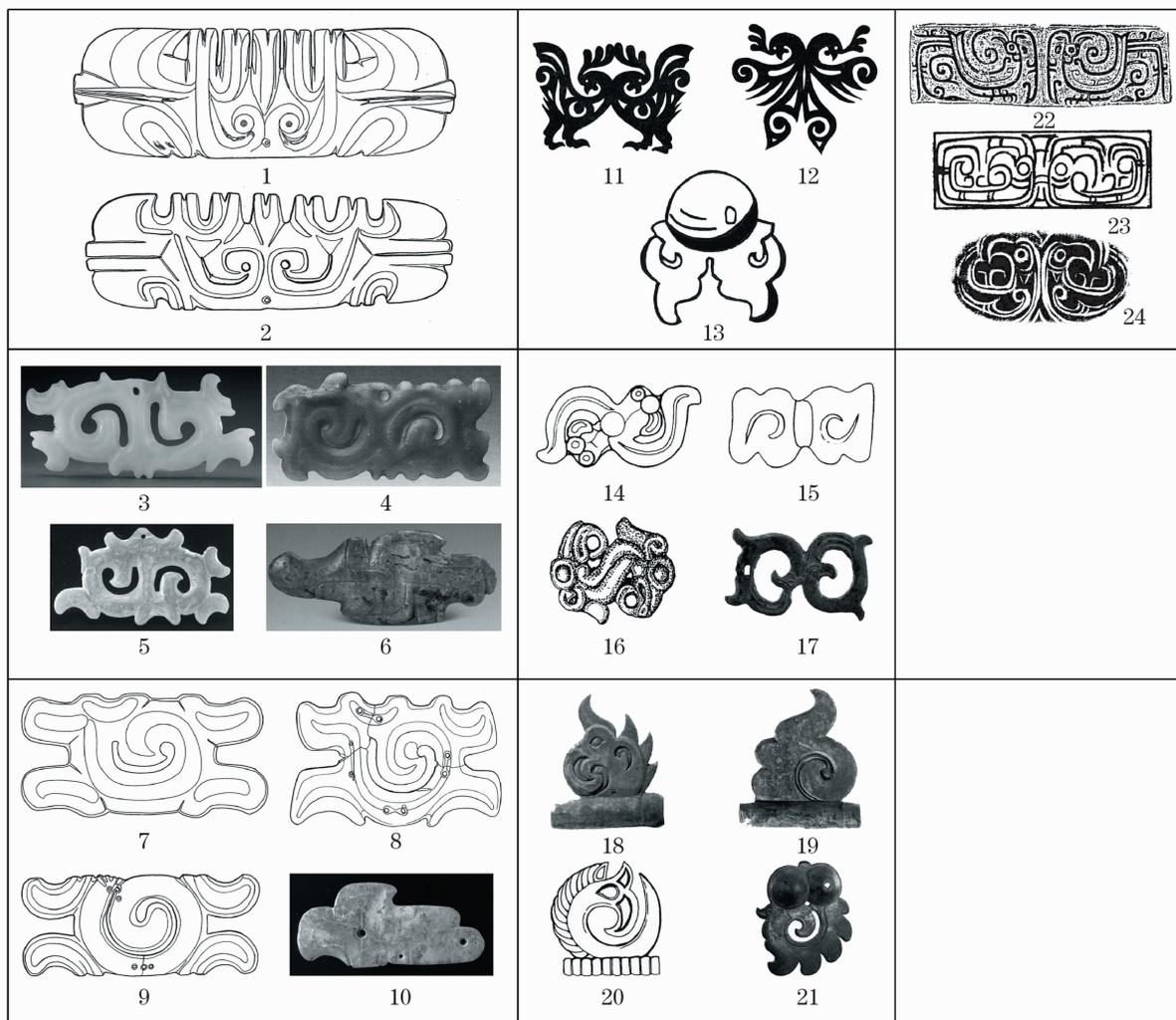


图二 红山文化与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动物造型

1. 半拉山 2. 那斯台 3—5. 牛河梁 6. 胡头沟 7. 阿尔然 8. 南山根 9、11. 鄂尔多斯 10. 阿克阿拉哈 12. 甘子堡 (7 取自 Грязнов М. П., 1980; 10 取自 Полосьмак Н. В., 2001)

利亚艺术（Скифо-сибирский звериный стиль）相比较更加合理。这不仅是因为其具有相同的分布地域（北亚）和文化传统（萨满教），更是因为红山文化玉器中很多别具一格的动物形象均见于北方系青铜器及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当中，比如，卷曲的动物²⁷，展翅的飞鸟²⁸，回首的双鸟²⁹、单鸟³⁰，合体的鸟兽³¹，龟³²等（图二）。

勾云形玉器，不仅是作者讨论的左右对称式的双勾云形玉器³³（图三，1、2），还包括中心对称式的双勾云形玉器³⁴（图三，3—6）以及单勾云形玉器³⁵（图三，7—10），更是能够与北方系青铜器³⁶及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³⁷中的双鸟和单鸟造型一一对应（图三，11—21）。从这个角度看，正如我们曾经指出，勾云形玉器所表现的应为回首的双鸟或单鸟造型³⁸。需要注意的是，不仅勾云形玉器的艺术造型在商周文化青铜器和玉器上有着直观的体现³⁹（图三，22—24），勾云形玉器自身也屡见于青铜时代早期以及商周文化墓葬⁴⁰，这说明勾云形玉器蕴含的美学或宗教观念，很有可能从红山文化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时期。



图三 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与青铜及早期铁器时代的双鸟、单鸟图像

1、2、7—9. 牛河梁 3. 故宫博物院藏品 4. 大利公司藏品 5、10. 首都博物馆藏品 6. 天津博物馆藏品 11、12. 巴泽雷克
13. 米奴辛斯克 14. 米沟 15. 小双古城 16. 菲尔索沃 17、21. 鄂尔多斯 18、19. 图埃克特 20. 阿克阿拉哈 22. 夆莫
父卣 23. 张家坡 24. 强家村（11、12 取自 Руденко С. В., 1953; 13 取自 Членова Н. Л., 1967; 16 取自 Шамшин А. Б.,
Чекрыжова О. И., 2013; 18、19 取自 Руденко С. В., 1960)

值得指出的是，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双鸟的造型有融合为兽面或人面的现象（兽面或人面由双鸟相对构成）。比如，王仁湘先生识别出的陶寺⁴¹、六合⁴²等遗址出土的“兽面”⁴³实际上是双

鸟，与枣阳九连墩2号墓^④中出土的玉佩饰相同^⑤（图四，1—3），而石家河^⑥、肖家屋脊^⑦、三星堆^⑧等出土的兽面或人面，双鸟的痕迹十分明显（图四，4—6）。如此，作者将左右对称式的双勾云形玉器与龙山及夏商周时期的兽面或人面相比较就不难理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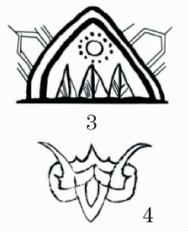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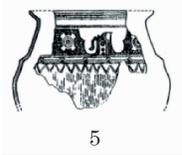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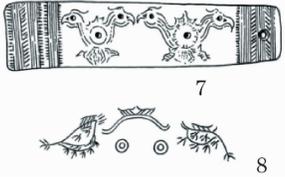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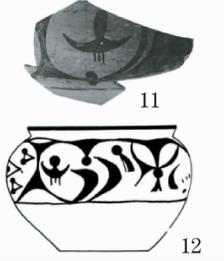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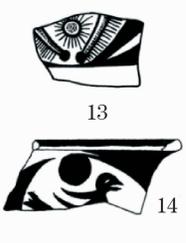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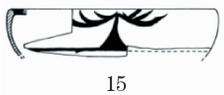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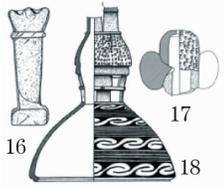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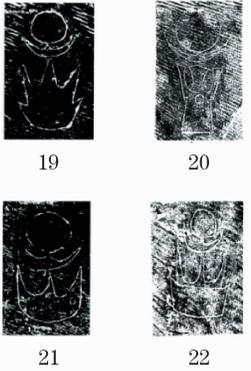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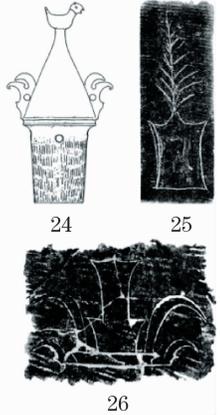


图四 双鸟及兽面或人面

1. 九连墩 2. 陶寺 3. 六合 4. 石家河 5. 肖家屋脊 6. 三星堆

通过与西伯利亚考古学及民族学中倒挂器物的对比，作者正确地判断出红山玉器的萨满教属性。“萨满教是东北亚土著民族中残留的宗教……他们把宇宙分上、中、下三层……宇宙间存在宇宙树，可以通天。萨满借着种种动物如鸟、蛇的帮助，得以上天入地与神鬼沟通。”^⑨神鸟作为萨满教中神灵升降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于勾云形器在红山玉器中尊崇的地位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神灵升降的另一个重要的工具是宇宙树^⑩，其不仅见于红山文化^⑪（图五，16—18），更经常与神鸟以及“日”形图案或兽面一起作为固定的组合，出现在中国史前及青铜时代以白陶、彩陶、玉器及青铜器为载体的原始艺术当中。比如，高庙文化的“双翼神面”^⑫（双翼为鸟，神面额上带三尖状树，图五，1、2），河姆渡文化的“双鸟负日”及“双鸟负神”^⑬（“日”及神面上带三尖状树；图五，7、8），仰韶文化的“三足鸟”^⑭（“三足”为三尖状树；图五，11、12），大汶口文化的“日月山”^⑮（“日月”为“鸟负日”，“山”为三尖状或五尖状树；图五，19—22），良渚文化的“双鸟负神”^⑯（神面上为三尖状树；图五，29、30），后石家河文化的“双鸟人面”及“虎脸双鹰”^⑰（人面及虎脸上有三尖状或五尖状树；图五，33、34）、商周文化的某些人面和兽面^⑱（额上有三尖状树^⑲；图五，39—41）等，均表现有双鸟以及双鸟之间的三尖状（或五尖状）宇宙树。既然以上图像中的鸟、树是萨满教中的神鸟与宇宙树，那么双鸟之间、宇宙树上的“日”和兽面，无疑是萨满教中的神灵。我们认为，鸟“日”树母题所描绘的，是神灵借助鸟和宇宙树升降天地的场景，是古代巫术宗教中巫觋通天观念的反映。值得指出的是，除了鸟“日”树主题以外，由其简化而来的“日”树、鸟“日”、鸟树等也在东亚和北亚地区广泛存在^⑲（图五）。另外，马家窑文化彩陶盆上被认为是“二人抬物”的纹饰^⑳（图五，28），所表现的恐怕也应该是“双鸟负日”，属于典型的萨满教题材。

由此可见，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萨满教传统也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长江流域的一些与萨满教有关的双鸟图像甚至要远早于东北地区，这显然无法全部用文化自北向南的传播来解释。我们认为，鸟“日”树母题在如此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存在，主要是基于人类早期社会中形成的古老的文化基因^㉑。这种共同的文化基因，是成型于商周时期的中华礼制文明的特质及背景，也是中

	鸟“日”树	“日”树	鸟“日”	鸟树、鸟、树
高庙文化	 <p>1 2</p>	 <p>3 4</p>	 <p>5</p>	 <p>6</p>
河姆渡文化	 <p>7 8</p>			 <p>9</p>  <p>10</p>
仰韶文化	 <p>11 12</p>		 <p>13 14</p>	 <p>15</p>
红山文化				 <p>16 17 18</p>
大汶口文化	 <p>19 20 21 22</p>		 <p>23</p>	 <p>24 25 26</p>



图五 鸟“日”树母题

1、2、5、6. 高庙 3、4. 千家坪 7、8、10. 河姆渡 9. 田螺山 11. 庙底沟 12. 大禹渡 13. 大河村 14、15. 泉护村
 16—18. 牛河梁 19—24. 尉迟寺 25、26. 陵阳河 27. 杨家坪 28. 宗日 29、30. 反山 31、32. 瑶山 33—35. 石家河
 36. 肖家屋脊 37、38. 萨穆希 39. 父己戎觶 40. 史尊 41、44. 三星堆 42、48. 妇好墓 43. 殷墟 M54 45. 鄂叔簋
 46. 凤纹簋 47. 张家坡 (3、4 取自郭静云, 2016; 37、38 取自 Есин Ю. Н., 2009)

华文明数千年不间断的精神支撑与思想底蕴。另外,考古发现及研究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萨满教道具在贝加尔地区逐渐由猛犸象牙转变为软玉,此后,“真玉文化从贝加尔向东渗透,自贝加尔湖东南进入黑龙江上游,随着大河古文化向我国东北发展”^⑬。最迟在距今8000年前,以软玉为中心的真玉文化在内蒙古东南及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中发展成熟,并在距今6000—5000年的红山文化中达到一个高峰。“随着红山文化玉器南传,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以至于龙山文化,在黄河中游一带至江淮地区,依次可以发现红山文化玉器影响的因子。中国新石器时代很多重要的玉器,都与萨满教原始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⑭那么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古老的萨满教传统,与真玉及真玉文化的散布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是否存在一个真玉文化的“底层”^⑮?这虽然是不易回答的问题,但《研究》一书通过质地鉴定和微痕分析所揭示的,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产自贝加尔地区的玉料以及“哈民式穿孔技术”、格拉兹科沃式“中孔轴心旋截技术”东传及在东北地区出现的历史是客观和清晰的,这为今后相关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正是因为如此,《研究》一书生产的知识,及其完全可以预期的对学术界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注 释:

- ①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3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1年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7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2年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10期。
- ②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尔沁博物馆、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2008年第7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C地点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11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遗址D地点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12期。
- ③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吉平、邓聪主编:《哈民玉器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下同。
- ④ 孟慧英:《考古与萨满教》,《北方文物》2002年第1期。
- ⑤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吉平、邓聪主编:《哈民玉器研究》,第34、35页;第281页;第342页;第281页;第388页;第385页;彩版一〇三、一〇四;第395页;第394页图三,6;第382页图三,6;第282页图十二;第338页;第342页;第390页;第392页;第185页;第405页。
- 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 ⑦ 邓淑苹:《解开红山文化玉箍形器之谜》,《故宫文物月刊》2009年第311期;郭大顺、黄翠梅:《红山文化斜口筒形器龟壳说——凌家滩的启示》,杨晶、蒋卫东主编《玉魄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详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下同。
- ⑩⑪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
- ⑫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掘》,《考古》2017年第2期。
- 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朐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临朐西朱封》,文物出版社2018年;另见《哈民玉器研究》第389页图十。
- ⑭ 邓淑苹:《谈谈红山系玉器》,《故宫文物月刊》1998年第16卷第9期。
- ⑮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掘》,《考古》2017年第2期;Грязнов М. П., Аржан: царский курган раннекиф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80.
- ⑯ 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 ⑰⑱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田广金、郭素新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 ⑲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Полосьмак Н. В., Всадники Укок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НФОЛИО-пресс, 2001.
- ⑳ 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贺勇、刘建中:《河北怀来甘子堡发现的春秋墓葬》,《文物春秋》1993年第2期。
- ㉑《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商务印书馆1995年;邓淑苹:《谈谈红山系玉器》,《故宫文物月刊》1998年第16卷第9期;郭大顺、洪殿旭编:《红山文化玉器鉴赏》(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14年,下同。
- ㉒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郭大顺、洪殿旭编:《红山文化玉器鉴赏》(增订本)。
- ㉓ 材料分别见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

- 文物保护中心:《岱海地区东周墓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王大户与九龙山:北方青铜文化墓地》,文物出版社2016年;鄂尔多斯博物馆:《鄂尔多斯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 ③⑦ 材料分别见于 Руденко С. В., Культура населения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3; Членова Н. Л.,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ранняя история племён тагар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67; Шамшин А. Б., Чекржова О. И., Предметы древне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из окрестностей села Фирсово, Степи Евразии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й 100 – 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М. П. Грязнова, Книга II,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2003; Полосьмак Н. В., Всадники Укок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НФОЛИО – пресс, 2001; Руденко С. В., Культура насел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Алтая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0。
- ③⑧ Ван Пэн,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культур бронзового и раннего 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а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Синьцзяна и Северного Китая, Вестник новосиби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2018. Т. 17, вып. 4。
- ③⑨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高伟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9),巴蜀书社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 ④⑩ 比如,大甸子墓地、妇好墓、琉璃河燕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叶家山曾国墓地、凤翔上郭店村墓葬等。
- ④⑪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 ④⑫ 荆州地区博物馆、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六合遗址》,《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 ④⑬ 湖北省博物馆:《九连墩——长江中游的楚国贵族大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
- ④⑭ 王仁湘:《崇鸟:古代艺术中的“对鸟”主题——从陶寺出土玉配饰的解读说起》,《玉根国脉(一)——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
- ④⑮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
- ④⑯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下同。
- ④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下同。
- ④⑱ 关于作为天梯的宇宙树和作为天梯之延伸的神鸟,见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 ④⑲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黔阳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4期。
- ④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下同。
- ⑤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文物出版社2011年;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韩建业、杨新改:《大汶口文化的立鸟陶器和瓶形陶文》,《江汉考古》2008年第3期。
- ⑤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蒙城县文化局:《蒙城尉迟寺》(第二部),科学出版社2007年。
- ⑤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
- ⑤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
- ⑤⑤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下同。
- ⑤⑥ 林已奈夫先生称为“蕤”,见林已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9页。
- ⑤⑦ 材料分别见于千家坪遗址(材料尚未发表,转引自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孙国平、黄渭金:《浙江余姚田螺山:河姆渡文化遗址2012年考古发掘》,《2012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3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200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旅游局、华县文物旅游局:《华县泉护村——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山东省考古所、山东省博物馆、莒县文管所:《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彩陶》,文物出版社1979年;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Есин Ю. Н., Древнее искусство Сибири: самусь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Томск: Том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纹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玉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
- ⑤⑧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5期。
- ⑤⑨ 即张光直先生所称的“文明的底层”,见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下同。
- ⑤⑩ 关于“底层”的概念,见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编辑、校对 阴美琳]